

世界名人論中國書庫

中國經濟調查

周奇雲
殷志靜 主編



95
F12
44
2

XAB34/66

世界名人论中国书库

中国经济调查

主编 周奇云
殷志静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133号

中国经济调查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北京市东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32开 11.375印张 25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065-394-3/F·036

定价: 8.00

序 言

编译本套丛书是我们的应有之责，也是我们久有的心愿。十年了，我们一刻不曾放弃，我们时时为之努力，共同的夙愿将我们联在一起。为了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赤子了解中国，了解外国人眼中一个真真切切的中国。我们搜集、筛选、编译，终于促成了这套由众多世界名人包括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著名记者，外籍华人和享誉全球的权威机构等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威性论述。他们以与我们不同的旁观者身份，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来论述我国的改革开放。由于这些不同，就更能引起我们深刻的思索。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情，认清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阅读的便利和思考的深刻，我们按内容分专题对文章作了粗略编排。必须指出，本丛书收集的文章涉及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题材新颖广泛，内容包罗万象，观点五花八门，总基调客观公允，但个别观点偏激。所有这些，敬请读者明鉴。

主编

1993年9月15日

参加本《丛书》编译组织工作的全体同仁是:

袁梦德	杨之文	王林才	于安	周奇云	殷志静
荆亚珍	苏蔚然	程维钧	张晓贴	徐文澜	崔俊阳
宋德志	李仲礼	鲁军	朱亚光	陈远忠	许霖秦
董多群	贾年	邓斌	车铁航	罗芸	熊志军
鱼永清	汪国伟	林达	李黎	张海林	肖劲
靳宁	姜南英	李纳	苏勇勇	杨砾	秦林
陈锡东	艾冰	丁克纯	申晴宜	许灵钧	侯晓楚
吴灏	周梦芹	李乾坤	朱亚松	董珏	陈忠
孙稼先	朱虹	肖丽	梁倩	江汤	沈新华
侯湘屏	徐骏	赵楠	罗静	于丽萍	刘玉婷
姬长衍	金小芸	张传秋	朱月萍	郑成	潘霞
李小玲	沈天翔	郑志宏	张理东	李直锋	金镜如
朱力	李玉新	詹小洪	刘劲军	庞松	吴亚平
方正夫	达扬	晓青	郁莹莹	荀春生	王光楚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的经济改革 (日本 小岛丽逸)	(1)
宏观经济调控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	(10)
计划与市场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	(26)
金融与投资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	(39)
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	
(世界银行亚州地区考察团)	(66)
改进宏观调控 (英国 亚历山大·尼科)	(83)
放松信贷将前功尽弃 (香港 陈文鸿)	(86)
当务之急是结构调整 (美国 陈乃润)	(88)
一九八八年中国经济总结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扎帕里)	(95)
一九九〇年中国经济调查	
(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104)
良好的德中贸易前景	
(德国 海因里希·魏斯)	(114)
中国经济调整纵论 (日本 海部俊青)	(116)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几点看法	
(英国 V·H·皮莱)	(125)

一九九一年的中国经济 (亚洲开发银行)	(127)
一九九一年的中国贸易和外汇	
(美国财政部)	(135)
一九九一年的中国贸易壁垒	
(美国贸易代表处)	(140)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能保持年率7%的增长	
速度 (世界银行 沙希德·贾维德·布尔基)	(153)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	
(美国 克莱德·法恩斯沃恩)	(159)
中国经济前途光明 (日本 奕芳禾)	(161)
台湾经验与中国经济改革	
(台湾 马凯张荣丰)	(169)

第二编

中国的通货膨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扎帕里, 世界银行 霍诺汉 等)	(182)
通胀的根源 (西德 葛礼慕)	(203)
通胀与供不应求 (日本 井上靖)	(219)
消费膨胀及对策 (美国 鲍斯沃思)	(223)
如何减轻通胀压力 (美国 克莱因)	(238)
如何治理通胀 (瑞士 林德)	(242)
未找到恰当方案的银行改革	
(英国 劳伦斯·科恩)	(246)
税制改革建议 (美国 秦汉明)	(247)
外债: 冒通胀之险 (法国 帕特里克·勒穆	

瓦纳)	(251)
从国情看外债 (香港 周八骏)	(254)
论中国价格改革 (西德 葛礼慕)	(263)

第三编

农村经济改革 (香港 程铁军)	(268)
农业问题日趋严重 (美国 国际日报)	(274)
发展的隐患与出路 (香港 陈耀坤)	(276)
使农民富裕的乡镇企业	
(日本 坂本进一郎)	(280)
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选择	
(世界银行 威廉·伯德)	(282)
论企业改革 (世界银行 林重庚)	(304)
加紧国营企业改革 (韩国 李英根)	(306)
充分认识电讯业的重要性	
(泰国 林明峰)	(309)
操之过急的股份制 (日本 富井次郎)	(313)
亟待发展服务行业 (美国 彼得·德鲁克) ...	(316)
如何与中国做生意	
(德国 莱茵哈特·蒂姆)	(319)
难啊! 在中国做生意 (日本 小谷长川)	(322)
合资企业问题 (韩国 申泰容)	(329)
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	
(法国 玛丽—洛尔·科尔松)	(334)
市场经济的制约 (日本 大久保勋)	(337)

高利润 大风险 (英国 丁·赫塞尔廷)	(340)
市场经济海洋中的礁石	
(俄罗斯 龙里·萨文科夫)	(342)
亟需完善的投资环境 (美国 蔡仁泰)	(348)
中国需调整外资政策	
(香港经济导报)	(350)
求变中的中国外贸政策	
(马来西亚 陈善忠)	(353)

第一编

中国的经济改革

(日本) 小岛丽逸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个时期：1950年至1978年；1979年至今。头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政府建立和推行了旨在实现高积累率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在实现高积累，人民就业和基本消费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消费水平方面却是不成功的。于是在第二个时期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消费的政策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始着手对过去建立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这就是始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正在产生各种新的矛盾，而能否解决这些矛盾并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消费，乃是决定这个时期经济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开放政策，就是旨在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新的选择。它既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补充伴随个人消费的提高而产生的国内投资资金不足。本文将就上述各点进行分析。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1. 个人消费普遍提高

解放以后到1956年为止，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目标是将

资本主义和封建经济转变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从经济发展的积累问题来看，就是要改变过去依赖少数统治阶层的浪费型经济，创造出崭新的积累模式。（1）消灭了消费阶级即买办官僚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并把民族资本家的各种资产置于人民政府的管理之下。（2）创造了利用税收和价格剪刀差将资金从农村集中到政府的积累方式。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价格结构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由农民革命支撑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逐步提高政府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将农村的工业品销售价格加以固定，推行了分配方面大幅度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但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关系长期以来仍然不利于农民。这种积累方式一直延续到1979年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为止。（3）创造出农民的劳动积累方式。“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借款，但其金额只占国家财政的2.5%左右。为了补充日益增加的消费和巨大的建设资金，政府动员农民进行水利和道路建设，扩大耕地、植树造林等。这种把建设劳动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方法就是劳动积累的方式。而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为这种积累方式实行提供了可能，因为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已不可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正因为成功地创造出这种积累结构，6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的情况下，确保了现代化武器的开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援助非洲各国所需要的资金。

在这个时期，不仅仅加强了积累，而且还保证了人民的基本消费和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基本确保口粮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带来了1962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但未能迅速提高个人消费水平。从1970年前后开始，城市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而农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则是

1978年以后才迅速提高的。统计资料表明，整个消费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消费支出和城市居民的个人消费得到大幅度提高。这表明，平均主义和普遍的节欲主义从70年代前期开始逐步减弱，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2. 粮食消费的变化

在中国，粮食产量一直按原料统计，它除了包括谷物以外，还把薯类按 5 : 1 计入粮食统计并包括大豆。粮食数量在达到人均300公斤的阶段时，如分配得当，在主食上大多数农民可以吃饱。人均粮食数量如不足250公斤，社会就会经常发生饥饿现象，在中国，1959—1969年就是属于这一情况。人均粮食数量超过350公斤时，酒类和动物蛋白消费量开始急剧增加；在超过400公斤时，粮食直接消费的绝对量就会减少，而谷物的间接消费进一步增加，出现许多因过饱而身体肥胖的人，从而开始建立使人变瘦的产业。当人均粮食数量超过430公斤时，在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社会，过半数的人民就处在饱食状态，80年代的日本就是这一类。

50年代日本与中国的人均粮食数量增加趋势几乎是平行的。但中国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在1959年—1961年人均粮食数量急剧减少，70年代初才恢复到300公斤的水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以前的好几年，已经达到了人民吃饱的阶段。1975年5月越南战争结束，这无疑进一步缓和了中国国内的紧张情况。人们要求进入新的消费阶段，而文革派却仍然推行严格节约和紧缩生活费的政治。文革派的衰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3. 衣料消费

在衣料消费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倾向。1959年至60年代前半期，即使是在北京和上海也看到不少穿带补丁衣服的人。当时人均衣料消费量（按纤维丝计算）大约为0.3—1.3公斤。人均衣料消费量超过2公斤时，在城市里就看不到穿带补丁衣服的人。中国的衣料消费是从1970年前后开始迅速得到改善的。人均衣料消费量超过7.5公斤时，人们就在穿戴上讲究款式多样化和色彩绚丽。进入八十年代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达到这一水平。1982年全国平均衣料消费量还是3.3公斤，但1983年取消了棉布的配给制。

各国的统计资料表明，人均衣料消费量的增加是以7.5公斤为界渐趋缓和的，说明超过这一水平后，对纤维消费的收入需求弹性值就转入1以下。人均衣料消费量处在7.5公斤以下时，由于它的收入需求弹性值为1以上，纤维消费需求就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迅速增加。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直到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1000美元水平时为止，中国有必要迅速增加纤维供给。可见，直到2010年前后为止，中国可能会把衣料生产按年率10%以上的速度增加。

4.耐用消费品

资料表明，进入70年代后，低档耐用消费品手表、收音机开始普及，70年代末缝纫机、电视机开始迅速普及。一般情况下，耐用消费品是在其价格下降到相当于工人两个月工资的水平时迅速普及的。这是日本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验，虽还没有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但我认为这个经验大体上亦可适用于中国。在日本，1960年前后完成了电视机的批量生产线，从而降低了电视机的相对价格。当时曾有两件事促进了电视机的普及过程：一是1959年皇太子结婚，二是1964年东

京奥运会的召开。汉城奥运会将在1988年召开，中国民众为了看这一节目将会进一步加强购买电视机的热潮，从而今后几年内电视机在中国将会迅速普及。

5. 公共消费和住宅

公共消费包括城市的公共消费设施、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教育。从总的来看，直至70年代后半期，公共消费有了大幅度提高。

住宅费是消费的最大项目。资料表明，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住宅总量的增加在1976年以前一直是缓慢的，始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说明在此期间人均居住面积进一步恶化了。这无疑是由于在60年代和70年代明显节约住宅建设投资的缘故。资料还表明，城乡新建住宅量从1978年起有了迅速增加。1979年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由此而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为农民大量建立新住宅提供了可能。在城市，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则开始把住宅建设放在优先地位。据统计，1958—1978年间住宅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3—8%，而1981、1982年这个比率迅速上升到25%。

如上所见，除了住宅消费外，整个消费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一直上升的，特别是公共消费得到了明显的上升。从整体上看，进入70年代后中国已达到能够保证人们的基本消费阶段。从此以后，人们必然会寻求更加丰裕的生活。文革派未能采取旨在满足人们这一欲望的政策，而现在的政权就是为了实现这一课题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目的是要把过去保证高积累的经济制度转变

成为能够满足日益增大的消费需求的制度。这个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即使是在1985年的时点上，它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的推动力。

1. 人民公社的解体

截至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的，解放后的经济建设路线也一直受到农村动向的巨大影响，例如1956—1958年的迅速“左倾化”是由于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发展带来的。1978年以后的“右倾化”也开端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

党中央从未采取旨在解体人民公社的引动，而只是在加强生产队权限的过程中，1980年在安徽省出现了个体农户。个体农户化这一趋势犹如星火燎原迅速发展，后来党中央不得不予以追认，这就是1985年1月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它规定农民租用土地的期限至少为15年，但没有规定土地上限；开垦荒地可租用30—50年；山林的土地属村所有，但树木的所有权可由子孙后代继承。

农业制度的改革从1985年起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政府不能依靠指令性计划掌握生产，因而采取通过流通过程间接掌握农业生产的方法。1983年起，中国进入农业生产过剩的时代，1984年又得到了大丰收，这就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愈益加重。因此，从1985年起政府取消了农产品的义务销售制，并限制了政府的收购量，例如粮食收购量的上限为800万吨，其余部分让农民自由出售。这说明，现在政府甚至放弃流通过程间接控制生产的方法。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党还没有将整个农民成功地纳入新的组织中。农业合作组织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能看到的，那就是把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加以合作

化的形式。如果把这一过程加以合作化，就自然会促进前向联系的农业生产资料供给部门和后向联系的产品出售和加工部门的合作化。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看到的，那就是把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交给个体户进行，而把前向联系部门和后向联系部门加以合作化的形式。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就是这种典型例子。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个体商人，尚未组成日本那样强有力的合作组织，因而农民在经营上的自由度比日本农民大。正因为农村经济已如此自由化，所以一方面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另一方面本身又有着深刻的矛盾。

2. 城市的经济改革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然是从1979年开始的，大体上与人民公社着手改革的时间相同，但改革速度要比人民公社缓慢。1984年10月党的三中全会决定，要把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特别是要转移到物价和工资的改革上。这二项改革会给其他领域带来很大影响，难度也最大。

6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在方向上可分为二种：一是在继续保持行政式经济运行方式的情况下，将中央政府的权限让渡给地方政府，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作法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以扩大市场机制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属于这一类型。前一种改革，中国在1978年前曾多次进行过试验，但1979年开始采取了前一种改革方向，把着眼点放在扩大市场机制方面。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目标是改变高度集权化的行政经济运行方式，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换言之，就是要建立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果来评价企业的

制度，在企业内则要建立根据实际成果来评价劳动者集体和个人的制度。这种改革有以下五个方面：

中小规模的国营企业向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化。过去国营企业受政府的直接管理，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则受间接管理。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在经营上不能得到政府财政的照顾，但在分配方面只要上缴所规定的税金即可，也就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权。过去6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一直使国营中小企业转化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金融改革。过去，中国的金融机关只起了为财政记帐的作用。现在已改革这种制度，赋予银行以能够控制国营企业经济活动的职能。企业得到财政资金时必须通过银行并付出利息，目的是提高资金周转率和企业经济效益。至于流动资金的筹集，则一律要通过银行贷款。银行还可以贷给企业以少量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资金。可见银行权限已明显扩大。

企业留用资金的扩大。扩大企业留用资金这是旨在改变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使之成为经济主体的基本改革措施。过去企业只能把利润超额的一小部分和折旧费的一小部分作为厂长基金留用，而现在允许将计划利润的一部分、折旧费的50%、利润超额的40%留在企业内使用。这样，企业可以使用资金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厂长权限的扩大。过去企业党委会握有绝对的权限。现在党委会只决定企业的总方针，而具体的企业经营权则交给厂长。厂长的人事权也有了扩大。

国家直接管理的产品品目减少。这是旨在扩大市场机制的措施之一。1985年把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产品品目从过